



巍巍泰山。 曹伟星 摄

弘扬泰山精神 谱写时代华章

□侯晓琳



泰山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圣之山，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泰山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弘扬泰山精神，对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积极向善的思想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泰山落日。 曹伟星 摄

◎ 书岱说

“乾隆射虎”史事新探

□周郢



古图中的“打(射)虎处”碑。 资料图

“泰山是中华文化史的局部缩影”

郭沫若曾说：“泰山是中华文化史的局部缩影。”泰山用巍峨雄壮的身躯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构筑了一个坚固无比的精神家园。经过长时间的积淀，泰山文化将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融为一体。

泰山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为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基础。远古先民崇拜泰山，据《管子》记载，古代部落首领登封泰山者有72人。进入封建社会后，秦始皇、汉武帝等6位皇帝先后到泰山封禅。因此，君

权神授的正统观念在泰山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泰山同时被儒、释、道三种信仰所推崇，表明了泰山文化的包容与博大。来泰山朝拜的信徒中，既有道教信徒，也有佛门弟子和儒家门徒。三种信仰相互影响，和睦共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进一步充实、融合了泰山精神。

说到泰山的民间信仰，不得不提泰山神和碧霞元君。泰山神又称“东岳大帝”，传说掌管一切生物的出生大权，作为泰山的化身，是上天和人间沟通的使

者，也是历代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是泰山影响力最大的女神。道教认为，碧霞元君“庇佑众生，灵应九州”，能扶弱惩恶、为人送子。北宋时期出现的东岳庙会，将泰山崇拜延伸到社会民众的最底层，每到泰山神和碧霞元君诞辰，香客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在老百姓心中，泰山的民俗神明是一种信仰、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以泰山神和碧霞元君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对扩大泰山文化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泰山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完美融合

民族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就越有生命力。从泰山文化中积淀而成的泰山精神亦是如此。原始社会，人们崇拜自然，位于东方、最早看见太阳升起的泰山便成为人们心中的圣山，体现了人们对光明和自由的向往与敬仰；封建社会，帝王为了巩固统治，开始在泰山封禅祭祀，泰山精神体现了古代帝王“大一统”的抱负和“君权神授”的思想；近代社会，面对他国的侵略，泰山成了凝聚人心、鼓舞

士气的源泉，体现了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收复河山的决心与气魄；当前，我国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泰山精神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彰显了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真抓实干的斗志与气魄。

泰山精神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泰山有着拔地通天的气势，攀登泰山体现了攀登者自强不息、敢于进取的人生态度。

泰山精神是扶正祛邪的正义精神。泰山石敢当的灵石传说，体现

了人们对降妖除魔、匡扶正义的崇敬与歌颂。

泰山精神是容纳万物的包容精神。至高无上的帝王在这里祈求国泰民安，普普通通的百姓在这里祈求去灾避祸。泰山将所有呼声容纳其中，让所有心有期盼者得到心灵的满足。

泰山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泰山将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完美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保护泰山生态资源，弘扬泰山精神

泰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历久弥新，每个泰安人都应将继承和弘扬泰山精神为己

任。2018年5月1日起执行的《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条例》，让泰山的生态保护有了具体标准。身为泰安人，除保护好泰

山生态资源外，还应弘扬积极向上、担当果敢、包容万物、吃苦耐劳的泰山精神，让自己成为他人走近泰山、了解泰山的一扇窗口。

年)十月五日，在其登祀泰山的前五日，“召大学士明珠、尚书伊桑阿、介山，学士席尔达，侍读学士朱马泰、徐庭玺，卿葛思泰、阿里虎、安泰于围中射猎。”(《康熙起居注》第3册，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美国汉学家张勉治对此解读云：“尽管康熙皇帝的泰山之行严格遵照起居注官们设定的脚本，但在圣王活动之外，他也进行了很多高度军事化的礼仪活动。举例而言……这场即兴的打猎活动是巡幸进入山东时的一个军事化仪式，背后包含着某些民族色彩……通过这种倾向性的姿态，康熙皇帝是在向山东的整个文官系统展现他在军事上的威力和对军事的高度关注。”(张勉治《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与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

立》《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乾隆帝此举，乃效颦其圣祖故伎，但更进一步，将围猎场地由巡幸途中直接改为泰山，更加彰显其象征意义。清初泰山虽有虎踪，但乾隆时迄未出现，此时突跃于泰山道旁，实匪夷所思，这应是乾隆帝有意布置，纵虎于此，再行围射杀。与中原王朝封祀泰山时纵释群兽以体现仁政理念迥然不同，乾隆帝欲借此昭示满洲王朝之特点，强化自己的族群认同，显示征服者之姿态。但此种行径被汉族史官认为有违于传统礼仪，失敬渎神，事属非礼，故有意在起居注、实录、方志中回避。由此可见康熙南巡中文武价值观念的对立与冲突，仍延续至乾隆南巡中，尤其在“乾隆射虎”一案中有鲜明体现。